

1920年代青年文化生态中的上海通信图书馆^{*}

李 哲

[内容摘要] 创建于1921年的上海通信图书馆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广大青年读者，积极传播进步思想，彰显了红色图书馆事业在思想建设、社会组织、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重大意义。这所图书馆以其创新的图书分类法、通信借还书制度和管理运行方式，有力地推动了五四新文化以至革命思想的传播，逐渐成为上海进步青年互通声气、交流思想的中心。该馆的青年文化社团性质，馆读之间诚挚而热烈的交流，以及信任读者、服务读者、追求共同进步的互助、合作精神和文化理想，彰显并成就了浸润着五四精神的1920年代青年文化生态，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关键词] 上海通信图书馆；青年文化；五四运动；图书管理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也是上海通信图书馆建馆一百周年。一个世纪之前，进步青年秉持追求真理的愿望和互助友爱的精神创办了独树一帜的上海通信图书馆，并在党的领导下发展壮大，以其创新的图书分类法、通信借还书制度和管理运行方式，为上海乃至国内外以青年为主体的广大读者提供了精神食粮，成为发扬光大五四新文化的重镇。考察五四新青年创办、建设上海通信图书馆的过程，以及该馆以党团组织为核心密切联系青年群众、开展思想交流、构建阅读共同体的工作经验，对于当代中国图书馆以及相关文化机构在服务青年、文化育人、引领社会风尚等方面的探索颇有助益。

一、上海通信图书馆概况

上海通信图书馆(以下简称“上通图”)始于应修人发起组织的读书同好会。1921年5月1日，时任中国棉业银行出纳股主任的应修人联合几位爱好读书的同事，发起、成立了上海钱庄业银行界青年职工互助性读书团体“共进会”。这个青年书友会逐渐扩大为一个对外开放的图书馆，并因可以通过通信方式借书还书而得名“上海互助团通信图书馆”，继而更名为“上海通信图书馆”，内部组织则定名为“上海通信图书馆共进会”。图书馆原本设在应修人工作的福源钱庄楼上，随着藏书和借阅者的增加，不久迁到天津路44号的一间房子，后又迁至横浜路天寿里91号。

1925年，在“五卅”风潮中，上通图又迎来了新的发展。该馆成立了共青团支部，应修人等骨干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上海通信图书馆月报》(以下简称“《月报》”)创刊。《月报》以及编印了多版的《上海通信图书馆书目》，极大地方便了读者借阅图书以及与馆员的交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百年中国科幻文学中的人类共同体想象研究”(项目编号:21XZW001)的阶段性成果。

流。在党的领导下，上通图的业务更加兴旺，遂三迁至宝山路三德里 A16 号，与创造社出版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及其附设的东方图书馆为邻。

上通图虽然一度受到大革命时代政治风潮的冲击，但很快就恢复了元气。1928 年，其藏书由建馆时的 138 种 281 本增加到 5000 余种 20000 余册，基本会员 450 人，读者亦有数千人之众，分布于全国 20 多个省市乃至南洋、日本、美国、法国等地。因支持图书馆的文化事业而加入“共进会”的名流甚多，其中有郭沫若、郁达夫、胡适等著名学者和作家。作为进步文化的一面旗帜，该馆与日俱增的影响力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敌视。1929 年 5 月 4 日，刚度过八周年馆庆的上通图被查封，所有书籍文件图章等均被没收，由其书写的五四新文化史光辉篇章遂告终。

二、进步青年的图书馆事业

上通图的诞生，与五四一代青年讲求互助友爱、关注社会改造的进步思想是密不可分的；而其创办和运作，又使得进步青年的理想得以落实。

通信借书之方法，并非应修人等首创，1920 年北大学生陈友琴、区声白等人就发起成立通信图书馆，并在号召大家捐助的启事中，阐明了普惠公众的图书馆之社会价值：“改造社会是一件很重大的事，不是少数人可以包办的。所以我们必要使人人均有读书之机会，领受一点新智识、新学说。纵使不能为改造社会之前驱，亦不至为改造社会之障碍。”他们还指出，能够长期研究学问的人是“少数的资本阶级”，而工人们忙于生计，又乏财力，既无书可阅，也无人请教，“所以文化运动虽是闹得很高兴，亦只是少数人受其益”。^①他们编制并赠阅图书目录，希望以通信的方法，让广大求知者有书可读。接受北大师生的慷慨捐赠后，1921 年该馆已拥有数千册图书。^②

相比最高学府菁英的社会关怀和启蒙意识，上通图在理念和实践上更具平民色彩。究其原始，该馆发端于应修人分享自家藏书的公益之举。应修人是五四时期崭露头角的青年诗人，也是一位酷爱买书读书的“书痴”。他把自己陆续购置的书刊放入“修人书箱”，供钱庄同人取阅。在他的带动和倡导下，爱好读书的同业人士逐渐聚集到一起，互通有无，至有兴办图书馆的举措。在《上海互助团通信图书馆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中，他们表示：

社会的进化由于人类能不断地思想，而思想传布和交换，实靠书报者为多。要考察一地方的进化与否，只须访问地方的图书馆兴盛与否。近来改造社会家多肯着眼于出版事业，这原是最可喜慰的事；但于读者一方面却很少人顾虑。试问在现代私产制度底下的人们，能有充足的读书期么？能有充足的买书力么？谁也不敢下个肯定的答复。没有图书馆以便利群众，则书报只能流通于掠夺阶级，这实非改造社会的初衷。^③

因此，创设上通图的“两大希望”是“成为远近人们的藏书库”和“为大规模的上海图书馆的先导”。应该说，上通图的同人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无论新文化的出版业如何繁盛，出版

① 《通信图书馆募捐启事》，《北京大学日刊》第 579 号，1920 年 4 月 20 日。

② 《北大的学生事业》，《北大生活》编辑部编：《北大生活》，北京大学北大生活社，1921 年，第 28 页。

③ 《上海互助团通信图书馆宣言》，《民国日报·觉悟》，1921 年 6 月 22 日。

机构都受制于商业法则，无从解决有求知欲而疲于奔命的人们缺乏“读书期”和“买书力”的问题，遂使新文化、新思想为一小部分有产者所专有。而与书报资源丰富、立意振导社会的北大学生相比，“共进会”发端于满足和丰富自己与周边同好的读书需求，更能体现“互助”和“联合”的时代精神。

上通图的组织运作方式很好地体现了《宣言》标举的公心。据楼适夷回忆，图书馆的藏书最初由“共进会”参与者捐出“各人自己所有的书”构成，并且每人每月还须从收入中分出一部分供图书馆添购新书。尔后吸纳的新成员也有纳费义务，但交费数额由每个人根据自身状况，在一元和十元间认纳，亦不构成在会员间划分等次的依据。图书馆的平等互助理念还体现为“没有职员，事务都由主持者在业余来做”；“共进会每年举行全体年会一次，产生一个干事会，执行一切会务和馆务……每周轮流值日，处理日常馆务”。^①借由会员的慷慨捐献和义务劳动，藏书不断充实，借书范围不断扩大，而近水楼台的会员亦在学识上收获丰厚。

三、服务青年的新型图书馆文化

上通图不仅填补了上海市公共图书馆的空白，更以其诚挚地服务青年的理念和实践，造就了一种新型的图书馆文化。正如《宣言》申明的那样，上通图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同好会，而是以服务广大青年为夙愿：“我们力虽无几，却很愿以这无几的力，尽用在这无人愿办的事业上。多认识几个有志读书者，多添我们几分感激；多借出几种有益的书报，便多添我们几分快慰。”^②这一宗旨随着图书馆的发展广为人知：“通信图书馆的用意在利用通信的方法，使远近各地方有志读书者，得以自由读看出租费的书。故于无力升学甚至无钱购书的青年最有帮助。”^③

为了让各地渴盼新知、追求进步的青年能够克服障碍、徜徉书海，上通图在制度上多有创新。

首先，尽量减免借阅者的费用。1921年的《上海互助团通信图书馆章程》声明，“我们所有书报，编成书目，并印借书约，备借书者索阅”，“凡载于书目的书报，都可来信借看，无须租费”。^④当此时，如无上海学术团体或上海互助团团员担保，借书尚需缴纳保证金，但一年之后发表的《上海通信图书馆章程》就取消了对保证金的要求。^⑤这之后，外地借阅者只要支付邮费，就可以从上通图借书。值得一提的是，上通图的会员虽然为图书馆出资出力，“而在图书馆中的权利，并没有比非会员有多大的优越”^⑥，这就意味着囊中羞涩者也能平等地享有读书自由。

其次，充分信任读者。上通图的特点，“是对读者的完全的信任，不取押金，不用保证，

① 适夷：《记上海通信图书馆》，《读书与出版》1947年第3期，第14—15页。

② 《上海互助团通信图书馆宣言》。

③ 《上海通信图书馆书目第五期出版》，《学生杂志》1925年第8期，第125页。

④ 《上海互助团通信图书馆章程》，《民国日报·觉悟》，1921年6月22日。

⑤ 《上海通信图书馆章程》，《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6月22日。

⑥ 建南（楼适夷）：《入会》，《上海通信图书馆月报》第6期（1926年），第6页。

无条件地信任借书出外，甚至可以用通信方式邮递出借”^①。这是对“国民素质”抱持成见的人难以想象的：

吴稚晖《舐盒客座谈》（按：应为《舐盒客座谈话》）中说法国某些图书馆，借书人可以自由借书出外，不取任何保证，如果这办法运用到中国来，保你不到一个月图书馆就会搬空了。吴先生说这话时显然对中国一批纯正的青年不曾认识，照我们整整五年工作的经验，前后近数万次的出借的书，损失的数字不过千分之七八，而且大都还是邮途上损失的。^②

这种信任是双向的、相互促进的。一旦证实图书丢失的责任不在借书人，上通图即不要求赔偿，然而借书人却往往争着弥补，“或是另买新书，或是用现钱，或是用价值相等的别的书”。于是，“在这种为大众服务的过程中，我们愈加觉得大众的可爱，而提高了服务的热忱”。^③“新青年”的精神风貌由是彰显：“可能我们那会的进步青年，不仅有绝对的求知欲，而且有旺盛的政治热情，都在黑暗中追求真理，遇到通图这样的关系，相互之间，有一种‘相濡以沫’的精神，是互相绝对信任的。”^④

最后，积极宣传推广，吸引读者。尽管上通图对于踽踽求索的有志青年堪称暗夜明灯，但图书馆的主事者并不坐等读者上门，而是在报刊上反复刊登启事，力求惠及更多读书人。1925年6月出版的《图书馆》创刊号上有一则别致的广告，题名为《不收学费的导师》，内容是：“我们工商界同志……组织成这个通信图书馆。购备青年必需的图书，俾受过智识荒而深感苦痛的，不必费经济，不必远离职业或家庭便能解决这种苦痛。”^⑤为了让借书者了解藏书情况，上通图编制了馆藏书目并不断更新，还创办了内容丰富的《月报》。为了更好地满足进步青年的阅读需求，应修人和许元启在1926年主持创制了“S. T. T. 图书分类法”，突出设置与马克思主义、反帝反殖、民族解放相关的类目。

上通图扶助大众的抱负和新颖有效的举措，使得诸多有志青年受惠良多、感铭心切。这个图书馆的意义，由当时的一位忠实读者的记述可见一斑：

上海通信图书馆又复活了，于是我也复得着我的生命的寄托所。说也奇怪，自去年春通信图书馆中止以来，这一年中我就尝到了人生的苦味。既无书籍可阅，生活已失了轨道，于是不幸的事情又接二连三的来个不了，我简直是再无勇气来“苟延残喘”。^⑥

事实上，作者曾自行购书多种，“然而买来的书我终不能拼命的阅去，放在书夹里决没有其他督促我的力量，于是我仍就感到无书可阅之烦闷——其实是缺乏督促力使我不能走专一的路，至此我愈感到上海通信图书馆给我的另一重的益处了”^⑦。可见，上通图不仅提供了书籍，还以“书非借不能读也”的心理态势，敦促读者潜心求知，从而成为因“同志的缺乏，书籍之难得”而向隅苦闷者的精神家园。

① 楼适夷：《关于上海通信图书馆的一封信》，《图书馆杂志》1982年第4期，第78页。

② 适夷：《记上海通信图书馆》，《读书与出版》1947年第3期，第14—15页。

③ 适夷：《记上海通信图书馆》，第17页。

④ 楼适夷：《关于上海通信图书馆的一封信》，第78页。

⑤ 《不收学费的导师》，《图书馆》1925年创刊号，第54页。

⑥ 张挚甫：《我所读之书》，《会报》1928年第37期，第61页。

⑦ 张挚甫：《我所读之书》，第61页。

四、阅读共同体与青年团结

上通图由几位青年白手起家创立，致力公益而蒸蒸日上、闻名遐迩，可谓成就斐然。但上通图同人并不满足于提供书籍，而是高度重视在读者借阅过程中与之发生的联系，并努力开展交流，从而构造了富有理想主义精神的文化共同体。

通过借书记录，上通图有意识地了解读者，并进而有所作为。“借书人在第一次借书之后就给他编定一个号码，制一张借书人卡，从这卡上，我们就可以看出这借书人的读书的倾向，倾向好的，我们便和他通信联络起来，慢慢的他们就变了会员，变了积极的工作者。”^①这种前大数据时代的读者行为分析和应用，不可不谓有心。如果说借由阅读取向的观察相对被动，始于《月报》第2期的“通信者”栏目堪称主动“出击”。其创设说明如下：

我们特地仿 Esperanto 书报式，开辟这小小的一栏，专为促进会员与借书者的情好，及借书者与借书者的联络。无论是会员是借书者，假使愿意与人通信，都可把名字和地址送到这儿来。我们希望能造成许多许多的好朋友。^②

在这个栏目中，上通图的几位核心成员各陈志趣、呼朋引伴，讨论话题非常多样，包含学术、国语、艺术、革命等。对于能够见面的左近读者，上通图另创一个“交谊会”，腾出周四晚上“作有益的谈话与娱乐……接受借书者的批评与指导，同时借书者可以询问我们所能够答复的事情，使两方面种种的隔阂都解除了，然后可以共同谋怎样把我们这个事业发展开去的大计划”^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通图的读者工作并不限于兴趣和馆务交流。“也有许多借书人，从办事精神上对我们发生了信任，便有提问题，提意见，委托事务的。甚至有外埠来沪，首先就来找我们，要我们给他指引路径、介绍学校等等，我们就尽力替他服务。”^④

上通图既有协助外地读者立足之举，就超越了同好社团的范畴，发挥了类似会馆的作用。但其出发点并不是乡情乡谊，亦非简单的趣味相投，而是超乎其上的文化和社会理想。生活在半殖民地大都会的上通图同人（核心成员大半为工商界人士），深刻地感受到支配社会的金钱法则对人际关系的毒化：“丑恶的拜金制度的社会，横陈在我们眼前，我们生来就呼吸不到丝毫的人生乐趣。到处都是冷酷无情，到处都是自私自利。”^⑤为了打破这个“以利相结”的铁屋，他们决心反其道而行之：“我们组织上唯一的信念，就是社会上许多人都是我们很爱好的友朋，而且我们的友朋，并不是以利相结合而是以纯洁的友情相结合，这个纯洁的友情，却是从求知的共同嗜好上发生出来的。”^⑥由读书求知结成阅读共同体，继而同声相应，携手与共，贡献资财、智慧及劳力于图书馆之建设，终成使成员普遍得到身心安顿的“友爱共同体”，这是上通图灿然可观的成绩：

就是在这小小的五年来的上海通信图书馆，可以证明将来新社会是怎样的快乐、和谐的生活！

① 适夷：《记上海通信图书馆》，第16—17页。

② 《通信者》，《上海通信图书馆月报》第2期（1925年），第15页。

③ 建南（楼适夷）：《纯洁的友情》，《上海通信图书馆月报》第5期（1925年），第6页。

④ 适夷：《记上海通信图书馆》，第17页。

⑤ Siu（应修人）：《上海通信图书馆与读书自由》，《上海通信图书馆月报》五周年特号（1926年），第6页。

⑥ 建南（楼适夷）：《纯洁的友情》，第4—5页。

在这个不以金钱利害结合的，平等，自由，博爱，大无我的小组中间，我仿佛已经踏进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社会，已能感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人生”真义了！^①

自创刊起，《月报》封面上始终题有世界语刊名，寄寓其中的期待正如应修人所言，乃上通图借书者能有“世界语读者样的如兄如弟如姊如妹的情热”^②。正是因为这种情热和友爱，馆员们承担着繁重的工作“还觉得很快乐”^③，乃至近二十年后，“全国各地和这图书馆发生过关系的人，一提起它来的时候，都还怀着一种像回忆青春美梦似的感情”^④。

五、党领导的思想文化阵地

1925年8月，上通图经历了一场重大风波。国家主义派主导的《醒狮》多次向上通图寄赠刊物，编审科均坚决退还，这引起了“上通图”创始人之一、执行委员会前总务科主任、国家主义信徒沈滨掌的强烈不满。当年8月1日，《醒狮》刊文指责上通图，称沈滨掌对该刊甚为同情，而“该馆中之共产派则恨《醒狮》入骨，竟至拒绝陈列”，沈氏“愤该党之专横，现已正式辞职”。上通图执委会开会商议后，认为本馆“负有传布进步的思想之使命”，故有理由将《醒狮》拒之门外，要求沈滨掌去信《醒狮》报社，据实说明辞职另有原因。然而沈氏最终不但不执行决议，反而以委员“态度激烈，措施失当”为由，率二十名会员（占当时会员总数四分之一）登报脱离上通图，一时间竟使该馆陷入“存亡绝续的危局”。^⑤

在风云变幻的1920年代，上通图作为一个影响力越来越大的青年文化机构，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纷争。事实上，从建馆《宣言》对“私产制度”和“掠夺阶级”的不满开始，上通图同人便有批判乃至改造社会的志向，唯取径不一，渐生不和，终至分道扬镳。这种分化在当时的青年群体中十分常见。围绕《醒狮》发生的这场斗争前后，正值“五卅”风潮，关注时局的进步青年在愤激之余不免彷徨，而在这个关键时刻，党在思想和组织两方面都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楼适夷曾说：“回想起来，如果没有党来领导，几个青年的小小事业是不可能坚持八年，留下深远影响的。”^⑥从上通图收藏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运动书籍，执委会主要成员对《向导》和《中国青年》等进步刊物的热心推介和对《醒狮》的排斥，以及1925年共进会中有恽雨棠（执行委员）、恽代英（监察委员）、杨贤江等多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来看，党在《醒狮》事件爆发时的确对上通图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在反共势力的威胁下，搬到横浜路天寿里的上通图没有退缩：“这时候我们好几个人加入了共青团，经常在这儿开会，请沈雁冰、赵世炎、杨贤江那些人给我们作报告。而这地址，事实也成了共青团闸北区的通讯处。许多会员和读者，

① 许元启：《人日颂》，《上海通信图书馆月报》五周年特号（1926年），第5页。

② 修（应修人）：《从“绿邮”徽章想起》，《上海通信图书馆月报》第7期（1926年），第3页。

③ 建南（楼适夷）：《纯洁的友情》，第5页。

④ 适夷：《记上海通信图书馆》，第14页。

⑤ 《为醒狮报造谣及二十人出会事告全体会员》，《上海通信图书馆月报》第1期（1925年），第5—11页。

⑥ 卢中岳：《楼适夷与上海通信图书馆》，《图书馆学研究》1982年第6期，第102页。

通过通图成为团员后转党员的人数不少。”^①在党的领导下,上通图不但没有像很多青年社团一样因为思想分歧而解体,反而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期:“那时不但馆务蒸蒸日上,我们内部团结一致,而且许多人开始走上实际运动的道路。”^②就这样,上通图成为众多进步青年走向革命的桥梁。

六、结语

存续八年之久的上通图,作为“上海第一个真正开放的公共图书馆”^③,堪称1920年代上海公共文化事业的一盏明灯,亦足为五四青年文化之代表、红色图书馆之先驱。一代青年以书会友,聚沙成塔,创办了自己的图书馆,复以普惠大众、改造社会的胸怀,信任读者、服务青年、共同进步的理念,各尽所能、竭诚相待的实践,将各地进步青年团结成阅读共同体,造就了崭新的图书馆文化,尽显青春中华之风采,时至今日对于图书馆等各类文化阵地的建设依然富有启发。

作者系重庆大学图书馆馆员

① 楼适夷:《关于上海通信图书馆的一封信》,第79页。

② 适夷:《记上海通信图书馆》,第18页。

③ 谢灼华主编:《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10页。